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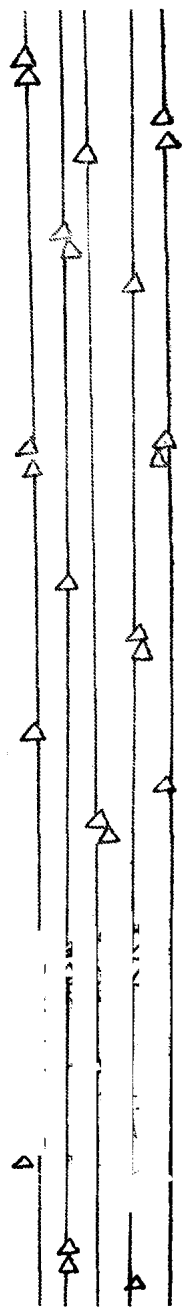
智慧之泉

——
『我的老师』征文选

教育科学
出版社

智慧之泉

——「我的老师」征文选



· 本社编辑部 编
· 教育科学出版社
· 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封面题字：郭预衡

封面装饰设计：王四海

责任编辑：唐伯学

封底篆刻：庞良仁

文字设计：黄 星

Zhíhuì Zhī Quán

智慧之泉

《我的老师》征文选

本社编辑部

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环西路10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房山县印刷厂印装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7.25字数145,000

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3,000册

书号：7232·288 定价：1.00元

手 迹

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播
站，延续世，和发展世，离不开教师。
人素相信旧处于黑暗野蠻是
昧的时代，教师的职业，应当受到
人们最高的崇敬。我国自古以来
就是个最尊重教师的国家，不
她居尊师，可见教师的地位之
高。汉语「恩师」一词，说明了教
师和学生的关系。人是不应该忘
却引导他走向正路的老师的。

王汶石 1955年
七月廿四日

编者的话

为庆祝教师节，在全社会造成尊师重教的风气，我们向各界人士，包括台、港、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发起征文，编辑出版《我的老师》《我的学生》两种文集。“征文启事”一经见诸报端，文稿就从四面八方投来。这里，有来自祖国边陲、海岛的，也有远涉重洋，来自异国他乡的。撰稿人上自耄耋之年的老翁，下至满脸稚气的少年儿童。他们当中，老师的老师，学生的学生，饱蘸着浓烈深沉的感情，叙写老师们高尚的情操，英雄的业绩，渊博的知识，精湛的技艺，诲人不倦的精神，慈母般的心怀，严谨的治学态度，科学的治学方法……这些文章，读来催人激动，引人肃然起敬。我们从中先选出若干篇编辑成册，以飨读者。文集取名《智慧之泉》。这“智慧之泉”借用了碧野同志的篇名，是富有诗意的。

文集所写的教师有：四十年代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，曾被周总理称作“三钱”之一的钱伟长，现代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教授李霁野，鲁迅研究专家、教授李何林，现代著名剧作家、三十年代执教于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的曹禺，著名戏

剧家、法国文学研究专家，教授李健吾，还有“左联”发起人之一、早年执教于上海中国公学的黄素（又名黄素如、白薇），执教多年的著名画家丰子恺等。

文章的作者主要有：现代著名作家碧野，现代作家、教授林焕平，现代诗人苏金伞，当代著名作家王汶石，当代作家蔡维才、张庆田，多年执教于解放军政治学院的林伯野、工学博士黄黔，还有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、现在美国核电部门任职的马国钧，居住在台湾的教授朱桂，我国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访问学者程娴等。

老教育家叶圣陶在抗战期间撰写的《如果我当教师》，经征得作者同意，并作了删改校订后，也收入本文集重新发表。这篇文章以精到的见解深刻论述了教师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，指出了教师应有的修养。它对我们今天作好教师工作仍然具有启迪作用。

我们的征文活动决定继续下去，热烈欢迎各位人士赐稿。

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五日

目 录

-
- | | |
|--|-----|
| (1) 如果我当老师 | 叶圣陶 |
| (14) 怀念故校长竺可桢先生 | 马国钧 |
| (31) 我的老师钱伟长 | 黄 黔 |
| (46) 良师益友 终生难求 | |
| ——怀念我平生最敬爱的老师李健吾先生 | 任明耀 |
| (60) 我的几位老师 (梁岫尘、顾随、
李何林、杨善荃、李霁野、万家宝) | 曾中蘊 |
| (75) 忆“缘缘”大师丰子恺 | 王质平 |
| (84) 我的老师嵇文甫 | 苏金伞 |
| (93) 记我的老师白薇 | 林焕平 |
| (105) 我的老师吕思勉先生 | 王志培 |
| (108) 微笑 | 李祥荪 |
| (113) 忘不了林榕老师的辛勤哺育 | 刘 晨 |
| (120) 我的第一个向导 | 王汶石 |
| (132) 智慧之泉 | |
| ——忆卓然师 | 碧 野 |
| (139) 高老师 | 张庆田 |
| (146) 老师恩德，没齿难忘 | 林伯野 |
| (152) 郑晓沧老师的心愿 | 韦俊世 |

目

录

-
- (160) “背功”特别好的人
——记我的老师董味甘教授 张 全
- (163) 他是凡人 也是伟人
——怀念老院长乐天宇 缪晓芳
- (168) 我的老师和父亲
——记浙江省特级教师、杭州四中副校长
程宝佩先生二三事 程 娟
- (172) 堂堂中国人
——一个平凡伟大的中国人 朱 桂
- (175) 我的老师 李 旷
- (179) 忆杜老师 蔡维才
- (185) 蚕被“没收”了！ 王介山
- (189) 最后一次讲课
——忆先师刘世儒副教授 周伯栋
- (193) 他，不仅是一支短短的红烛—— 欣 耘
- (202) 忆我中学的语文老师 焦 锐
- (206) “孔雀妈妈” 刘纯艺
- (210) 啊，园丁！ 杨祝祥
- (214) 我和我的老师 全慎修

如果我当教师

叶圣陶

我现在不当教师。如果我当教师的话，我想用以下的话策励自己。这无非“以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”的意思。“以前种种”是过去了，追不回来的了；惭愧是徒然，悔恨也无补于事；让它过去吧，象一个不愉快的恶梦一样。

我如果当小学教师，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，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；无论聪明的 愚蠢的，干净的，肮脏的，我都要称他们为“小朋友”。那不是假意殷勤，仅仅浮在嘴唇边，油腔滑调的喊一声；而是出于衷诚，真心认他们作朋友，真心要他们作朋友的亲切表示。小朋友的长成和进步是我的欢快；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。有了欢快，我将永远保持它；有了忧虑，我将设法消除它。对朋友的忠诚本该如此，不然，我就够不上作他们的朋友，我只好辞职。

我将特别注意，让小朋友养成好习惯。我想“教育”这个词儿，往精深的方面说，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，可

是就粗浅的方面说，“养成好习惯”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。无论怎样好的行为，如果只表演一回两回，而不能终身以之，那是扮戏；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，如果只挂在口头上说说，而不能彻底消化，举一反三，那是语言的游戏；都必须化为习惯，才可以一辈子受用。让小朋友养成好习惯，我将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；硬是要养成，决不马虎了事。譬如开关门窗，我要教他们轻轻的，“砰”的一声固然要不得，足以扰动人家的心思的“咿呀”声也不宜发出；直到他们随时随地开关门窗总是轻轻的，才认为一种好习惯养成了。如果种植菜蔬，我要教他们当心着意，根入土要多少深，两本之间的距离要多少宽，灌溉要怎样调节，害虫该怎样防御，这些都得由知识化为实践；直到他们不论何时何地种植植物总是当心着意，才认为又一种好习惯养成了。这种好习惯不仅对于某事物本身是好习惯，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。对于开关门窗那样细微的事，尚且不愿意扰动人家的心思，还肯作奸犯科，干那扰动社会安宁的事吗？对于种植菜蔬那样切近的事，都能为收到成效而切实下功夫；对于自然原理的认识，社会现象的剖析，还肯节省功夫，贪图省事，让它马虎过去吗？

我当然要教小朋友识字读书，可是我不把教识字教读书作为终极的目的。我要从这方面使小朋友养成语言的好习惯。有一派心理学者说，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；所以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。一个词儿，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念，怎么写，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含义和限度，该怎样使用它才得当。一句句子，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说，怎么讲，

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语气和情调，该用到什么场合才合式。一篇故事，不但使他们知道说的什么，更要借此发展他们的意识。一首诗歌，不但使他们明白咏的是什么，更要借此培养他们的情绪。教识字教读书只是手段，使他们养成语言的好习惯，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，才是终极的目的。

我决不教小朋友象和尚念经一样，把各科课文齐声合唱。这样唱的时候完全失掉语言之自然，只成为发声部分的机械运动，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。既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，那么随口唱熟一些文句，又有什么意思？

现当抗战时期，书本的供给很成问题，也许临到开学买不到一本书，可是我决不说“没有书本，怎么能开学呢！”我相信书本是一种工具，或者说是一种凭借，却不是唯一的工具，唯一的凭借。许多功课都不一定要利用书本，也可以说，文字的书本以外还有非文字的书本。非文字的书本罗列在我们周围，随时可以取来利用。利用得适当，比较利用文字的书本更为有效，因为其间省略了一条文字的桥梁。公民，社会，自然，劳作，关于这些课程的非文字的书本真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；书铺子里没有书买，又有什么要紧？只有国语是非有书本不可的；然而我有黑板和粉笔，小朋友还买得到纸和笔，也就没有什么关系。

小朋友顽皮的时候，或是做功课显得很愚笨的时候，我决不举起手来，在他们身上打一下。打了一下，那痛的感觉几分钟就消失了；就是打重了，打得他们身上红了，发肿了，隔一两天也就没有痕迹；这似乎没有多大关系。然而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们的身体，同时也打了他们的自尊心；身

上的痛感或红肿，固然不久就会消失，而自尊心所受的损伤，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。我有什么权利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呢？并且，当我打他们的时候，我的面目一定显得很难看，我的举动一定显得很粗暴，如果有一面镜子在前面，也许自己看了也会觉得可厌。我是一个好好的人，怎么能有这种可厌的表现呢？我既要作他们的忠诚的朋友，要让他们养成好习惯，又怎么能对着他们有这种可厌的表现呢？一有这种可厌的表现，以前的努力不是根本白费了吗？以后的努力不是将会不生效果吗？这样想的时候，我的手再也不敢举起来了。他们顽皮和愚笨，总有一个或多个原由；我必须根据我的经验，通过观察和剖析找出原由，再根据原理给以对症的治疗。只要切切实实这样做了，还会有一个顽皮的愚笨的小朋友在我的周围吗？这样想的时候，我即使感情冲动到怒不可遏的程度，也就立刻转为心平气和，再不想用打一下的手段来出气了。

我还要作小朋友的家属的朋友，对他们的亲切与忠诚，和对小朋友一般无二。小朋友在家庭里的时间比在学校里来得多；我要使他们养成好习惯，必须与他们的家属取得一致才行。我要他们往东，家属却要他们往西，我教他们这样，家属却教他们不要这样；他们便将徘徊歧途，而我的心力也就白费了。作学生家属的亲切的忠诚的朋友，我想并不难，拿出真心来，从行为上、语言上、态度上表现我要小朋友好，也就是要他们的子女弟妹好：谁不爱自己的子女弟妹，谁还肯故意与我不一致？

我如果当中学教师，决不将我的行业叫做“教书”，犹如我决不将学生入学校的事情叫做“读书”一样。书中积蓄着的古人和今人的经验，固然是学生需要的；但是就学生方面说，重要在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，尤其重要在能够随时随地就事物物得到新经验——不限于书中的经验。说了“读书”，便把这个意思抹杀了，好象入学校只需做一些书本上的功夫。因此说了“教书”，也就把我当教师的意义抹杀了，好象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没有什么分别。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是大有分别的：他们只须让学生把书读通，能够去应考试，取功名，此外没有他们的事儿；而我呢，却要使学生能做人，能做事，成为健全的公民。在这里，我不敢用一个“教”字。因为用了“教”字，就表示我有这么一套本领，可以把这套本领双手授与学生。难道我的做人做事的本领能够说已经完整无缺了吗？难道我能够肯定的说我就是个标准的健全的公民吗？我比学生不过年纪长一点，经验多一点罢了。他们要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经验，我就凭年纪长一点，经验多一点，给他们指点一些方法，提供一些实例，免得他们在迷茫之中摸索，走了许多冤枉道路才达到目的——不过如此而已。所以若有人问我干什么，我的问答将是“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”；我决不说“教书”。

我不想把“忠”“孝”“仁”“爱”等等抽象的德目向学生的头脑里死灌。我认为这种办法毫无用处，与教授“蛋白质”“脂肪质”等名词不会使身体得到营养一样。忠于国忠于家忠于朋友忠于自己的人，他只是顺着习惯之自然，存

于内心，发于外面，无不恰如分寸；他决不会因为想到德目之中有个“忠”字，为了要实做那个“忠”字，才这样存心，这样表现。关于“孝”“仁”“爱”，也是如此。进一步说，想到了“忠”字而行“忠”，那不一定是“至忠”；想到了“孝”字而行“孝”，那不一定是“纯孝”；因为那是“有所为”，并不是听从良心的第一个命令。为要使学生存心和表现切合某种德目，而且切合得纯任自然，毫不勉强，我的办法是在一件一件事情上，使学生养成好习惯。譬如，当学校里需要人力的时候，如扫除或筹备什么会之类，我自己奋力参加，同时使学生也奋力参加；当社会间发生了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我自己看作切身的事，竭智尽力地图谋最好的解决，同时使学生也看作切身的事，竭智尽力地图谋最好的解决；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，养成学生的好习惯，综合起来，他们就实做了“忠”字。为什么我要和他们一样地做呢？第一，我是一个公民，我听从良心的第一个命令，本应当“忠”；第二，这样才算是指点方法，提供实例，对于学生尽到了帮助他们的责任。

我认为自己与学生是同样的人，我过的是与学生同样的生活：凡希望学生去实践的，我自己一定实践；凡劝戒学生不要做的，我自己一定不做。譬如，我希望学生整洁，勤快，我一定把自己的仪容、服装、办公室、寝室弄得十分整洁，我处理各种公事私事一定十分勤快；我希望学生出言必信，待人以诚，我每说一句话，一定算一句话，我对学生和同事，一定掏诚相示，毫不掩饰；我劝戒学生不要抽烟卷，我一定不抽烟卷，决不说“你们抽不得，到了我的年纪不妨

抽”的话；我劝戒学生不要破坏秩序；我一定不破坏秩序，决不做那树党分派，磨擦倾轧的勾当。为什么要如此？无非实做两句老话，叫做“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；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”必须“有诸己”“无诸己”，表示出愿望来才有诚意，吐露出话语来才有力量；使人家易于受感动。如果不能“有诸己”“无诸己”，哪里还有诚意？表示和吐露的时候，自己先赧然了，哪里还有力量？人家看穿了你的矛盾，至多报答你一个会心的微笑罢了，哪里会受你的感动？无论学校里行不行导师制，无论我当不当导师，我都准备如此，因为我的名义是教师。凡负教师的名义的人，谁都有帮助学生责任。

我不想教学生做有名无实的事情。设立学生自治会了，组织学艺研究社了，通过了章程，推举了职员，以后就别无下文，与没有那些会社的时候一样；这就是有名无实。创办图书馆了，经营校园了，一阵高兴之后，图书馆里只有七零八落的几本书，一天没有一两个读者，校园里蔓草丛生，蛛网处处，找不到一棵象样的蔬菜，看不见一朵有生意的花朵：这便是有名无实。做这种有名无实的事情比不做还要糟糕；如果学生习惯了，终其一生，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这样有名无实，种种实际事物还有逐渐推进和圆满成功的希望吗？我说比不做还要糟糕，并不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，主张不要有那些会社，不要有图书馆、校园之类的设备。我只是说干那些事必须认真地干，必须名副其实。自治会硬是要“自治”，研究社硬是要“研究”，项目不妨简单，作业不妨浅易，但是只要提了出来，必须样样实做，一

毫也不放松：有了图书馆硬是要去阅读和参考，有了校园硬是要去管理和灌溉，规模不妨小，门类不妨少，既然有了这种设备，必须切实利用，每一个机会都不放过。而且干那些事决不是一时乘兴，既然干了起来就要一直干下去，与学校同其寿命。如果这学期干得很起劲，下学期却烟消云散了，今年名副其实，明年却徒有其名了，从整个过程说起来，还是个有名无实，还是不足以养成学生的好习惯。

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，都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，如国文科在训练思想，养成使用语言文字的好习惯，理化科在懂得自然，进而操纵自然之类；同时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，那就是“教育”——造成健全的公民。每种功课犹如车轮上的一根“辐”，许多根辐必须集中在“教育”的“轴”上，才成为推进国家民族的整个轮子。这个观念虽近抽象，可是很关重要。有了这个观念，我才不会自顾自的教自己的功课，不与别的教师取得联络；有了这个观念，我才不会贪图省事，把功课教得太松太浅，或者过分要好，把功课教得太紧太深。至于做人做事，原是分不来科目的：譬如，一个学生是世代做庄稼的，他帮同父兄做庄稼，你说该属于公民科，生物科，还是数学科？又如，一个学生出去旅行，他接触了许多人，访问了许多古迹，游历了许多山川城镇，你说这该属于史地科，体育科，还是艺术科？学校里分科是由于不得已；要会开方小数，不能不懂得加减乘除；知道了唐朝，不能不知道唐朝的前后是什么朝代；由于这种不得已，才有分科教学的办法。可是，学生现在和将来做人做事，还是与前面所举的帮做庄稼和出去旅行一样，是综合而

不可分的：那么，我能只顾分科而不顾综合，只认清自己那门功课的目标而忘记了造成健全的公民那个总目标吗？

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，决不专作讲解的工作，从跑进教室开始，直到下课铃响，只是念一句讲一句。我想，就是国文课，也得让学生自己试读试讲，探求文章的意义，揣摩文章的法则；因为他们一辈子要读书看报，必须单枪匹马，无所倚傍才行，国文教师决不能一辈子伴着他们，给他们讲解书报。国文教师的工作只是待他们尝试之后，领导他们共同讨论：他们如有错误，给他们纠正；他们如有遗漏，给他们补充；他们不能分析或综合，指点他们分析或综合。这样，他们才象举步的幼孩一样，渐渐的能够自己走路，不需要人搀扶。国文课尚且如此，其他功课可想而知。教师捧着理化课本或史地课本，学生对着理化课本或史地课本，一边是念一句讲一句，一边是看一句听一句；这种情景，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，多么滑稽又多么残酷啊！为什么说滑稽？因为这样之后，任何功课都变为国文课了，而且是教学不得其法的国文课。为什么说残酷？因为学生除了听讲以外再没别的工作，这样听讲要连续四五个钟头，实在是一种难受的刑罚。我说刑罚，决不是夸张；试想我们在会场中听人演讲，演讲者的话如果无多意义，很少趣味，听了十分二十分钟便感觉厌倦了；即使讲演者的话颇有意义，富于趣味，如果延长到三个钟头，我们也要移动椅子，拖擦鞋底，作希望离座的表示；因为听讲到底是被动的东西，被动的东西做得太久了，不免有受刑罚的感觉。在听得厌倦了还不得不听的时候，最自然的倾向是外貌在那里听而心思并不在听；这当